

林楠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 历史承接性研究

林楠 著



DANGDAI CHONGGUO DAODE JIANSHE
DE LISHI CHENGJIEXING YANJIU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历史承接性研究 / 林楠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495-4163-8

I. ①当… II. ①林…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
道德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D64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7245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 421008)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86 千字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M U L U

第一章 当代人的道德迷失与伦理困惑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研究思路	16
第二章 道德建设的历史溯源	20
一、传统道德的概念厘清	20
二、传统道德的历史境遇	35
三、传统道德的历史超越	52
第三章 道德建设的理路厘析	61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继承性的基本立场	61
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髓与现代价值	71
三、社会主义道德与传统美德的价值契合	92
第四章 道德建设的时代诉求	108
一、中国社会转型变迁的道德诉求	108
二、全球化时代文明对话的发展应然	121
三、当代伦理学转型的价值选择	140

第五章 道德建设的实践回应	152
一、伦理精神的重建	152
二、道德生活的回归	163
三、道德教育的重塑	173
参考文献	184
后记	192

第一章 当代人的道德迷失与伦理困惑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一论断,精辟地概括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方法和途径,指明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方向,是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中国的现代化从20世纪初提出,到20世纪末真正启动,时隔近60年。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始终与反传统的道德批判交织在一起,虽然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甚至存在着针锋相对的意见,但并没能从理论与实践上真正解决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展问题。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不能回避传统的问题,任何时代的道德建设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与传统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主义道德也不例外,它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我国社会主义道德既是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批判继承的结果,也是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进行创造和创新的结果。国内外发展的大量事实证明,传统道德中的精髓不但不影响本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且已经成为维持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风尚、协调人际关系、增强国家凝聚力的重要精神力量。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保持自己的主流价值观念和道德风范,是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必须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相承接,从而

将当代中国的道德发展、道德体系建设与伦理精神传统根源的关系问题再次提到学术的论域中。基于此,本书将研究的选题锁定在中国道德建设的历史承接性研究,试图在深入探究我国社会道德发展特质的基础上,解开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与传统美德“如何承接”的矛盾和难题。

(一) 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困惑

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最关键的字眼,是中国历史上正在进行的一场伟大变革,并开始引发当代中国社会全方位的变化与转型。毫无疑问,“现代化也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的转型”^①。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上,大概没有哪一个民族或国家像中国这样面临着如此强大的前现代阻力(集中表现为举世仅见的漫长封建社会史),承受着如此深刻而复杂的前现代“革命”经历(接二连三的民族战争和国内战争,以及形形色色的革命斗争),在如此险恶和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展开从被孤立封闭到主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试验和实践。在中国文化赖以生存的现实境遇、在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与现实维度,这一演绎的后面却是充满着深沉的历史负重和巨大的艰辛与痛楚的过程。因为,“它会根本性地改变或转换我们世代代的传统道德规范与价值秩序”^②,它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最后一场决战”^③。

事实上,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无法完全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的预制,相反,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只能在不断更新、创造其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和过程中得以发展和实现。任何民族对现代化道路的寻求最终都要探索伦理道德精神的现代化之路。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

① 许纪霖,陈凯达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 1800~1949),第2页,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

② 金耀基:《现代化、现代性与中国的发展》,第2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③ 韦政通著:《伦理思想的突破》,第175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其独特的历史逻辑和文化方式开启了。也许没有人否认经济是开启现代化的动力,但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其思想的变革却是以‘伦理的批判’为先导的。无论是20世纪初‘历史进程意义’上的开启,还是20世纪末‘经济变革意义’上的开启,都无一例外地与伦理的批判相伴随。这与其说是一种偶然,不如说是一种必然。这个必然性至少蕴涵着这样的问题:伦理道德在中国文化思想资源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中国现代化的开启与传统的批判认同具有不可分割的意义。”^①

应如何解读这种“必然”?换言之,这种不可分割的意义究竟蕴涵着什么?在中国社会从现代化启蒙到实现现代化的近百年历史进程中,有三次重要的思想交锋是必须回顾的。20世纪初爆发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出于对民主、科学、理性启蒙的急切期待,新文化的启蒙者举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号。一方面,当时批判的重点是旧道德,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道德中的“三纲五常”,反对其专制的、等级的、封建的消极因素,这无疑是对中国的思想启蒙和社会进步有着积极意义的。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对延续了五千年而不衰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否定与批判,引来“德先生”、“赛先生”,企图以此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也留下了值得反思的遗憾。事实上,这种激进的方式却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并未能让中国跟上西方国家前进的步伐,反而如同鲁迅笔下描述的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同泼掉的结局那样,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也不加分析地摒弃了。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把阶级斗争作为治国之纲。阶级的对峙、斗争与决裂被泛化地移用到文化继承中,用政治方式解决文化和思想问题,从而出现了否定传统、摒弃“旧”文化的倾向,结果酿成了重大的历史悲剧。从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到吴晗的“道德继承论”,这些原属“传统道德的继承问题”的学术探究,被错误地定性为政治态度问题,从此,学术探知彻底演变成了政治斗争。紧随其后的“文化大革命”则以全面否定传统、毁灭文化道德遗产的简单粗暴方式扼杀了所有理论和实践

^① 李萍:《现代道德的传统承接:可能与实现》,载《中山大学学报》,2004(4)。

上继承探索的努力,对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的进一步探讨,也一度成为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禁区”。

中国道德建设应何去何从,如何解决道德建设中无法回避的历史继承性问题?可以说“这是我们在 20 世纪并未真正解决的一道世纪难题”^①。到了 20 世纪末,与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相伴随,我国再一次掀起了文化反思的热潮。此次的传统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对西方文化的充分肯定,把反传统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换言之,新旧交替中的焦虑,价值转换的真空,成为人们投向西方文化的契机。显然,这种对传统的批判带有极强的逆反心理。

作为一个正处在急剧变革,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社会的道德实际状况,似乎正在或者已经成为一个跨世纪的“现代性”问题。如有国内学者所言:“‘现代性’具有其极强的扩张力量,其基本元素,诸如市场经济、政治民主、科学理性和无限目的论的现代进步主义文明(化)价值观念等,都具有开放、普遍化和无限扩展的特征。但‘现代性’与其说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模式概念,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发展和文化知识进步的定性概念,通过摆脱传统和古典,它力图展示并标举一种具有全新性质的人类文明和文化。”^②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日益摆脱宗族村社生活模式并日益分化、疏离的当代中国社会里,由于传统伦理在现代社会生活所需求的理性价值规则上的缺失,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无序、困顿与紧张的境况难以避免,但同时也彰显了对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中社会主义道德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价值性与现代性意义。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为使中国走出现代社会生活困境,一些学者纷纷提出各种发展与创新的传统伦理:如有学者倡

① 万俊人:《世纪回眸:“道德中国”的道德问题》,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3)。

② 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第 170~171 页,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导“五伦”之外的“第六伦”^①、有学者提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之说,^②等等。诸种言述,与其说是对中国传统伦理的继承与发展,不如说是对“现代性”的中国“地方性知识”的探索。作为中国现代伦理孕育与生成的历史背景与理论渊源的传统文化,深刻制约着社会伦理的状况及其变迁,亦印证了民族文化及其价值的“历史惰性”。因此,现代化中的伦理变迁,“既是古老的历史在新世纪的骤然断裂,又是这一历史在以往的传统中静悄悄地绵延”^③。现代化中的伦理变迁和批判既是不断变革传统、超越传统的过程,又是不断回归传统、创造传统的过程,是变革传统与传统变革的有机统一。

然而,在我们这个曾经被称之为“道德文明古国”的国度里,道德文明的当代境况却存在着令人“深重忧虑”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在批判封建伦理道德的过程中忽视了对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传统道德的开掘与继承,割裂了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之间的联系,对资产阶级道德原则一概否定,完全排斥建立在资本主义文明之上的有利于人类进步的道德,对其引用与借鉴讳莫如深,造成了道德资源开发的片面性。在现代化建设中,如何充分有效地发掘并利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丰富资源,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与中国传统道德资源的内在整合,使之合理转化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德建设的智慧资源,从而建立起既能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悠久、连贯而富有现实生命力的优秀道德文化传统,又符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的“中国现代性道德知识”,是学术界目前关注的热点。

作为一种德性伦理的典型,中国传统伦理在社会生活中的德性人伦诉求与规范架设上相当成熟和完备,传统伦理心性层面追求崇高道德人格与“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以及传统伦理日用层面的德性诉求,

① 韦政通著:《伦理思想的突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② 林毓生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③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 1800~1949),第3页,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

无疑对于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和个人精神世界的拓展具有相当积极价值和意义。历史反复证明,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中华传统伦理道德都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它溶进新的时代生活。一方面,中华传统伦理道德的某些形式和内容具有普遍的意义,在任何时代都可以直接运用,有些形式和内容加以适当改造即可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这种可溶性使它完全可能为我们建设新伦理、新道德服务。另一方面,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它本身必须对民族文化(包括伦理道德)予以继承和发展。因此,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基础上的道德文化建构,必须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现实经验,必须整合中国道德文化传统中优秀而富于时代价值的历史资源,必须开放地、有选择性地汲取现当代道德知识系统中具有普适意义的文化因素。现代中国甚至整个“文化中国”的社会伦理生活经验表明,传统美德仍然发挥着独特、持久的影响。今天,当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步向深入,全球化叩开国门,“传统继承”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这次我们需要的是日臻理性的考量与取舍。我们不能再漠视传统美德在现代的失落,而是应该发掘其深含的时代价值,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二) 现代生存方式的道德迷失

肇始于轴心时代,对中华民族产生巨大影响的传统美德,不但在20世纪前的传统生存方式下有巨大的生命力,而且在21世纪全球化的生存方式中,无疑还会继续发展。在越发深刻的全球化大潮中,传统、封闭、狭小、自足的生存方式逐渐退出现代人的视阈,在这一场生存方式深刻的变革中,我们迫切需要寻找现代生存方式的精神家园与心灵依托,生存方式的转换与现代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的搭设,同样赋予当代中国道德建设历史承接性研究的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摸索和尝试的阶段,成为时代主导性的发展思维与发展语言被确立起来,当全球化、网络化、市场化的特殊境遇作为时代的生存方式被确立起来时,人的精神价值世界变动的景观也格外壮观。我国正处于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时期:全球化、网络化

和市场化不仅逐渐改变人的生存环境、生存条件和生存方式,而且还会逐渐演化人们的生存理想,导致整个社会生活和道德观念都发生深刻变革。

全球化最早是在经济领域发生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的交往范围逐渐扩大,个人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了前市场经济阶段的狭隘的“群生活”,过上了普遍的“类生活”,成为普遍的类存在物。“经济全球化在造成人们普遍、全面的经济联系的同时,物化社会关系的异己性也在全球规模上表现出来。”^①全球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际遇,它首先打破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它不仅把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活动纳入了世界的范围,而且把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置于全球视野之中,人们在新的生存实践与交往活动中,构筑了新的社会关系格局与人伦价值秩序,而新的生存也为之作出充分价值合理性论证。全球化,实质上是人的活动方式、存在方式的社会化发展,是人自身的需要、能力、社会交往关系的全球化发展。在全球化生存方式下,高速、巨频的“流动”、“交往”成为时代生活的样态,人力、文化、资本、商品更加密切、更加迅速地在世界各地融合、流动,成为这个时代人基本的生存方式。全球化使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使人的生存时空大大拓展,由局限于一个民族国家之内发展为超出民族国家的局限成为世界范围内广泛意义上的人。全球化把世界连成一体,使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的文化价值观念更具有穿透力,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深入异质的文化价值环境中。不同文化与价值的激荡,必然不断冲击和洗刷人在过去封闭、单一的环境下形成的保守、封闭的精神气质。全球化打破了传统文化封闭、保守、僵化的特性,在精神与心性层面塑造了民族开放、创新的气质,使现代化所企盼的自主人格、彰显个性和自由价值选择的主体性精神得以充分张扬。而且全球化的同一竞争平台也必然催生个体主体性,全球化时代成为强调自身素质、开发潜能、实现个人发展的新时代。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制度的民主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性、开放性日益加强,传统社会的人伦秩序对

① 李淑梅:《经济全球化与人的发展》,载《南开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3)。

个体的制约日渐式微,而个体性在现代社会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在现代社会的生存方式中,人们不仅有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的完善自我本性、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条件,而且在现实中人们越发以独立个体存在、以自觉的价值意识和主体意识步入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与发展中。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越来越多地穿越了民族和地域的藩篱而走向世界,成为全球多元文化中的一种声音。“全球化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①使得离开全球化来谈本土化,离开普遍的价值观念来谈民族区域的文化意义,几乎成为不可能。在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普遍关联的场景之中,要想对传统美德的价值和意义有所说明,就必须要有新的空间观念和全球化的意识。

现代社会的发展不能不面对网络高度发达所带来的挑战,网络化时代正在极其深刻地改变着人类思维和生存方式。网络作为现代人本质力量的体现与新的生存方式,它对社会精神文化价值的影响与改变是如此深刻和剧烈,以至于许多人对它带来的社会生活与价值观念的颠覆性变革一时无所适从,不少人甚至将现代信息网络技术视为打破传统价值与生活意义世界的“异己力量”。以研究网络文化著称的美国哲学家迈克尔·海姆在他的《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一书中用既诙谐又富含哲理性的语言说道:“今天,一个反玄学的时代已经开始担心从虚拟实在冒出来的危险幽灵,自80年代起,哲学的电话铃声便响个不停。我不知道这种事是应让我笑呢还是哭。”^②人们对网络技术带来的物质层面的变迁尚未完全做好准备,网络价值理念已迎面袭来。文化心理定势及惯性难免使人们对传统价值保持着强烈的眷恋,而对现代新的颠覆性的伦理价值观念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和强烈排斥的心态,现代化中的伦理价值的变迁产生于社会抗拒的心态之中。网络作

① [英]吉登斯著:《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第2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② [美]迈克尔·海姆著:《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第143页,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为人类从未体验过的一种生存模式,拓展了人类的日常生活世界,增加了人类生存的张力,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实践活动本身。在实践维度上,网络使人类跨越了时空边界,大大延伸了交往与实践的范围,丰富了人类的生活,提高了生存质量。网络使人类在真实与虚拟世界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在延展人类活动空间的同时,提高了人类的心智,张扬了人类主动求索、应对挑战的智慧,创造了可能性的空间。在交往方式上,网络化改变了人类交往的形式,这种新型的交往起码具有“交往的对话性”与“交往的全球化”两大特征,无论是从互动性还是实名制上来看,网络上的人类交往都是自由的,它在个体与全球之间架设了直通的文化桥梁,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生存方式。^① 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际遇,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与网络社会的出现,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生活方式,推动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传统道德与现代信息技术及网络化社会的矛盾与紧张,除了表现在网络已对传统道德生成的根基——人们的物质生活与交往方式的巨大改变外,信息时代中网络化生存带来的网络文化精神具有强烈的现代性意义,它在对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保守性、封闭性的精神理念与气质的不断冲击和洗刷中,使人们不断走出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生活圈子与固有的价值观念,走进现代的生活方式,形成开放的思维视野与价值理念。

市场化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全球化与信息化挑战的回应方式,是迄今最合理、高效的经济组织与社会运行方式,它是中国现代化中最能反映现今时代特质的要素,是现代中国社会区别于传统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制度表征。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过程就其所实现的社会进步过程而言,就是社会和人的现代化过程。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以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存发展景况作为依据,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依次更替的三大形态: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个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他指出:“人的依赖性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

^① 韩璞庚:《网络与人的生存的张力》,载《哲学动态》,2001(12)。

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①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超越自然经济的市场经济,实现了人的存在方式由“人对人的依附性”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性转变。换言之,市场经济按照自己的要求去塑造全部的社会生活,从而塑造了人的新的存在方式。马克思把人的这种存在方式的本质与特征概括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深刻地揭示了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的存在方式由“人对人的依附性”到“人的独立性”的转变规律。然而,市场经济中“人的独立性”只能“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因此,这个转变只是由“人的依赖关系”转变为“物的依赖关系”。可见,马克思既充分肯定市场经济的巨大历史进步性,又深刻揭露出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揭示了市场经济状态下人的存在方式的内在矛盾。

沿着唯物史观所揭示的从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的基本路径,人们不难找到市场化给精神文化带来的深刻变革。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或者说,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的时候,社会文化精神中最核心的部分,即对人及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问题的理想就必然要相应地得到彻底的改造。”^②亚当·斯密从人的自然权利出发强调经济人对自己的生产有自主权和对自己在生产中投入所带来的收益有支配权,并把市场经济秩序描述为最符合人类本性的自然秩序。与亚当·斯密偏重于人的自然本性来研究市场经济不同,马克思在研究社会时则凸显了人的社会性。马克思在分析市场经济中人的劳动具有私人性和社会性之后,认为能否实现由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的转化成为关乎商品及其生产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② 陈宴清主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第60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

命运的惊险的跳跃,强调了以前人们所忽视的人的社会性。但同时要看到“市场经济把它的等价交换原则渗透到全部社会生活中,并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由此便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异化(无休止的攫取造成的‘全球问题’),人与社会的异化(社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扭曲),人与他人的异化(金钱关系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紧张),人与自我的异化(人异化为金钱的奴隶而造成的自我的失落)。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现代人的这种‘物化’与‘异化’,使人愈益深切地感受到‘精神家园’的失落:世界的符号化和自然的隐退所形成的‘无根’的意识;价值尺度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所形成的‘没有标准的选择’;终极关怀的感性化所形成的‘信仰缺失’、‘形上迷失’和‘意义失落’”^①。我们要明确的是,尽管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孕生于西方的文化道德土壤之中,而且在其生成过程中又促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的道德的理念、信念和律令,但是我们植入和接受市场经济绝不意味着也不可能连带地全盘植入和接受西方的文化和道德。这不仅因为文化、道德及其传统不可能完全否定,而且亦不可能完全移植。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辨析,在扬弃的过程中,实现价值转换与创新,从而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市场化、全球化和网络化的生存境遇,全面置换了传统农业社会的存在基础与社会关系格局,在传统生存方式与人伦秩序的立身之基被动摇之后,社会整体价值生态的变迁是深刻的,在某些方面甚至具有颠覆性和撕裂性的意义。全球化、网络化、市场化不仅逐渐改变人的生存环境、生存条件和生存方式,带来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而且还会逐渐衍化人们的生存理想,导致整个社会生活和道德观念的深刻变革。重构生存理想,重建精神家园,已现实地摆在国人面前。必须承认,全球化、网络化、市场化正以其强大的工具理性精神、无所不在的数量化及物质化冲击着人的生存空间,它在改变并提高人的生存质量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它创造了

^① 孙正聿著:《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第2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发达的物质,鼓励了人对物欲的追逐,同时也在淡化着人文精神,冷漠了人的精神世界和人对道德精神的维护。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并非全然与现代生存方式格格不入,其精华性的、作为优秀文化积淀的精神理念深深地注入民族性格之中,我们理应对支撑民族的历史、组建当代人生活方式的传统抱以尊重和敬意,努力维护和保持自己民族文化和道德的特色。

(三) 道德建设的文化向度

基于唯物史观立场,传统道德与农业文明基础上生长的政治制度和精神文化,是一种共生关系。当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思想观念发生变迁,道德体系的历史转型就不可避免,即文化模式的变迁必然引发道德体系的变迁。当代中国社会最直观层面的特征就是社会转型,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鉴于此,可以说我国正处于现代文化模式的渐进形成时期,道德转型或道德现代化问题是社会转型的内容之一,但是道德转型并不顺利,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令人不安的断层。当我们欢庆中国社会终于走上现代化的正轨时,却突然发现道德的无所依靠和价值标准的茫然失据,在否定了原有的道德体系后,没有及时建立起新的道德体系,于是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空洞。可以断定,没有精神生活的内容充盈与意义丰富,中国的现代化必将是无根的浮萍。中国现代化在器物层面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观之后,精神领域的建设与发展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因此,道德的建设是深层的、内在的、精神领域的现代化之路。

道德既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也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恩格斯指出:“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①人的实践和社会发展,是各种道德体系生长的土壤。道德不是经济关系的自然产物,不是政治制度的附庸,也不单纯是精神或抽象思想观念的现实化。国内有学者认为,道德不仅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同时也是一种人类文化现象。“马克思用以分析道德异质的哲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